

View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bankers in 1912-1949

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第一辑）

民国银行家

论社会责任

刘平
编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Views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bankers in 1912-1949

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第一辑）

民国银行家 论社会责任

刘平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银行家论社会责任/刘平编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

(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

ISBN 978-7-5476-1301-6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银行—社会责任—研究

IV. ①F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9206 号

民国银行家论社会责任

刘平 编著

策划 陈占宏

责任编辑/陈占宏 装帧设计/张晶灵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7.5 插页:1 字数:203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301-6/F·609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民国时期,曾经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内部管理、人才培养以及社会责任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不少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这些文献或详或略,体裁也有所不同,但在我看来,其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和智慧,对于今天的银行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民国银行家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陈光甫日记言论集》、《周作民日记书信集》、《钱新之往来函电集》、《叶景葵文集》等专集的正式出版,为金融史专业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民国银行家文献的系统整理,或者是进一步利用,都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银行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他们对民国银行家在银行管理方面的思路、想法和措施,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又苦于没有一个较为合适的读本,能够较为方便地阅读和了解。

为了解决当今银行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实际需要,同时兼顾金融史专业研究者的需要,笔者策划并主编了这套《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计划分为若干辑,其中既有若干位银行家文稿的合集,也有银行家个人文稿的专集,今后将陆续编辑出版。

目前出版的《民国银行家管理思想论丛》第一辑,共分为三册,集中收入了若干位民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银行家文稿。这些文稿的作者,均担任过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总行经理级的,也有少部分分行经理级的。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册：《民国银行家论社会责任》。主要反映了民国银行家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中国经济发展、工商业实业统筹、农村金融、战时金融、金融消费观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银行家从事银行经营管理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册：《民国银行家论业务经营》。主要反映了民国银行家对于银行发展战略、经营思路、业务开拓、风险管理和控制、网点设置、对外服务等问题的观点和想法。

第三册：《民国银行家论内部管理》。主要反映了民国银行家对于银行内部组织建设、办公秩序、人事管理、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思考和设想。

本辑涉及的民国银行家，有的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稿，有的则相对较少，究竟应该怎样取舍？有些银行家的文稿也可能同时涉及了几个专题，比如有些银行家的谈话，谈到了社会责任，也谈到了经营管理，甚至还谈到了内部管理，又究竟应当如何把握？考虑到整套丛书的篇幅，同时也是为了兼顾到各册之间的平衡，最终选择的方案是，在每一个专题即每一册中，每位银行家只收入一篇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稿。对其中较为特殊的“谈话录”，则依据内容涉及的专题，在对文字不作任何增删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归类。

为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文稿选择尽可能体现了体裁的多样性，有已在公开报刊正式发表的文章，也有演讲稿、工作报告、私人书信、内部谈话录，等等。这些文稿，主要来源于民国时期公开出版的期刊，以及银行出版的内部刊物等，还有少部分则直接选自档案史料。当然，由于笔者的视野所限，挂一漏万，也很可能是在所难免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时进一步补充完善。

本辑收入的各篇文稿，都附有作者简介，并尽可能配发作者照片。应该说，这是一件难度不小的工作，尤其是一些不太出名

的银行家,无论是生平介绍,还是个人照片,确实都不太容易找到。现在书中所附的作者简介,有的非常简略,主要原因还是相关资料匮乏所致。至于书中所附照片,有部分是从上海市档案馆等处的银行职员档案中查找所得,个别甚至还是从当时银行职员合影中截取的。然而,尽管多方寻觅,还是留下不少遗憾,有数位银行家的照片至今未能寻获。如读者朋友有所发现,敬希赐悉,笔者自然是非常感谢的,并将尽可能在修订时予以补充。

犹豫再三之后,笔者还是在每篇文稿之后,附上了一段简要的“编后絮语”。毕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些“编后絮语”,与其说是“导读”,倒不如说是笔者的“读后感”,表达的是对近现代中国金融史的敬畏,以及向当年银行前辈们的致敬。当然,如能收到一点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自然是笔者内心极大的期待了。

在编选过程中,所选文稿除排版关系及原稿质量等原因,删除了极少量图表外,其余皆为全文照录。除将繁体变作简体,异体改为通行,并对部分文稿重新标点,以适合今人阅读习惯外,遇有文字错、讹、衍、漏等情况,酌情判断,或保存原貌,或径直改正。凡同一题目分期连载者,合为一篇;每篇稿末注明原刊卷、期和刊行时间,以便参考。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文稿字迹确实难以辨认,尽管进行了多方比对,仍可能留有遗憾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在书稿编选过程中,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教授,上海市档案馆副馆长邢建榕研究员,上海银监局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克渊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王强教授,以及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等单位,给予了许多鼓励和具体支持。

在资料查找过程中,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

书馆等单位,给予了许多协助;

在资料复印、录入、编辑和校对等过程中,我的同事和朋友陈靖、仇戈、苏玉梅、徐进、朱明宝、王好为、梅茗丽等,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帮助。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上海远东出版社徐忠良社长,以及本书责任编辑陈占宏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上海市档案馆彭晓亮先生,作为本书的特约编辑,无论是相关档案史料的检索、核对,图片资料的筛选,以及文字润色等,都耗费了许多心血。他细致认真、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些年来,对民国时期相关金融史料的整理、出版,以及写作,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我的家人始终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笔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徐平' (Xu Ping)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2017年5月于上海

贝祖诒	1		
报告参与世界经济会议情形			
陈光甫	7		
吾国经济改造的根本问题			
陈湘涛	19	71	霍宝树
旅行事业对于国民经济之贡献			工业放款拟注意的几个问题
陈行	25	78	贾士毅
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			长期抗战与外汇统制
戴蔼庐	36	84	金国宝
金融机关之当面问题			银行现行保证制度之废除与改进
戴铭礼	47	89	康心如
取缔私票问题			战时银行界的责任与技能
谷春帆	52	94	李 铭
中国产业金融之动态与危机			回到繁荣之路
顾翊群	58	107	林凤苞
提倡收买民间金银运动			提高银价与中国
胡笔江	62	112	林康侯
我国蚕丝业之回顾与前瞻			上海银行界与内国公债
胡祖同	65	118	刘攻芸
论银行业之发展			推行储蓄与紧缩通货
		129	刘航琛
			防止走私与国民经济建设
		133	钱新之
			识字是生活上必要的条件

盛竹书 136
继任银行公会会长之宣言书

寿毅成 139
浙江最近之社会经济观

宋汉章 145
国货外销

182 徐新六
四川在我国之经济地位

孙瑞璜 148
银行业当前的厄运与对策

188 叶景葵
中国之银行管制

唐庆永 152
中国银行制度之病态

204 俞佐廷
金融业如何有健全之发展

唐寿民 158
发展生产须研究工商业之经济方法

211 张嘉璈
内地与上海

王延松 163
提倡国货之出路

217 章乃器
金融业之惩前毖后

王志莘 166
农村繁荣与银行出路

233 赵棣华
经济恐慌中金融界应有之责任

吴鼎昌 170
统制经济问题

243 周作民
华北产业之发展与金融之关系

徐寄庾 178
二十年来兑换券之信用

254 朱博泉
战时上海金融之病态及其治疗

265 资耀华
中国金融界有急须创办信用
调查机关

贝祖诒(1893~1982)

原名骥祥,字淞荪,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1911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入公立唐山矿山路矿学堂学习。1914年任中国银行北京总行会计,1915年调任广州分行代理会计主任,后任总会计师兼营业主任,1917年任广州分行副经理。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后,任分行代理经理。1918年任香港分行经理。1927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及外汇部主任。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专营外汇的银行,被推为代表私人股东的董事兼总行营业主任。同年11月中央银行成立,任监事。1930年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1931年为华盛顿国际商会联合会会议代表。1932年任上海银行公会联合准备会常务委员。1934年任中国建设银公司执行董事。1935年参与币制改革。1938年4月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1939年后任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1941年,任中英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国代表和中国银行总经理。1946年3月至1947年4月,任中央银行总裁。1947年8月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寓居国外。曾任美亚保险公司董事长、纽约斯泰保险公司顾问。1959年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副董事长,1960年任行长。1982年12月27日在纽约去世。



——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在本行九十四号演讲

报告参与世界经济会议情形

宋部长邀约同赴欧美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时，适总经理有恙，而一方面宋部长力促同行，固辞不获。旋幸总经理病体见愈，因在疗养院中商决而行。

方才总经理说：余此次出国，可使世界人士知中国银行有此足以代表中国之人才，增高本行地位，间接不啻登一广告；同时并希望任何事情，不论其效果如何，均须参加其间，多少可为本行张声势云云。过承奖勉，实不敢当。但愿全行同仁本此精神，共同迈进，以副总经理之期望。至世界上经济方面任何问题，如一一加以研究，无不与银行有关。

此行历时四月，以在美英两国时间居多，其余各国为过路性质。初意仅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原拟不赴伦敦。后因在英召集世界金融经济会议，宋部长力促同行，是以赴英。中国目标重在银子问题，美国亦因世界不景气之主因，归咎于金子减少，不够支配，希望各国中央银行准备中，能容纳一部分银子。盖近年以来，因金贵的缘故，世界物价愈益跌落，贸易上发生种种障碍，益以人民之窖藏，金子更不敷需要，于是一般学者对于金子如此缺乏，银子是否有帮助金子的价值，认为有共同研究之必要。

美总统罗斯福之政策，首在如何自拔于不景气之中，而跻于繁荣之途。故美国于金融风潮之后，即由议会赋予总统以经济上绝大之权力，处理一切。美总统所实行之政策，完全系揣摩美国一般普通人民之心理，而谋经济组织之大改革。同时由各国研究根据国际洛桑会议议案，由国联发起，联合各国举行世界金融经济会议，以期开诚布公，共谋救济办法。当时美国以经济会议不谈战债

为参加之条件,国联亦以战债并无普遍之共同性,允不提出讨论,于是决定召集;且为慎重起见,先期举行国际专家会议,从事研究金融经济会议议事日程,并将研究结果,拟具报告,送达各国。

美国考虑之下,对于金融问题,曾经拟了一个提案。其提案内容:(一)主张仍用金为国际货币本位;(二)中央银行之准备金应由百分之四十,改为百分之二十五;(三)中央银行百分之二十五准备金中,得搭用百分之五银子;(四)各国国内货币流通仅能用钞票,不准用硬货;(五)民间不得窖藏金子;(六)金子买卖应经各国中央银行交割。譬如美国人在英国买卖金子,其交割应经过英伦银行与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如此一国的金子,其来踪去迹,皆易于稽考也。

但如各国中央银行的准备,均搭用百分之五的银子,则尽印度政府之藏银,及世界上积余的银子,尚不敷用,银价便要大涨,于我国经济上,要发生重大影响,不能不有一深切的讨论。即美国国内对此意见,亦不一致。或者谓银价无提高之必要,盖银价一经提高,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不利,中国的物价要低落;或者谓价低,中国的购买力便见薄弱,便要影响到世界上的贸易。华盛顿会议席上,他们希望我国代表对以上两说,下一断语。当时告以:(一)安定银价,中国极所希望;(二)如世界物价提高,而银亦在相当范围中同时上涨,不使物价对银价超过比率,亦不反对。此说两无偏倚,美方表示满意。会场中有人询及如果提高银价,拟提高至何种程度。毕德门不加思索即回复:须恢复至美金六角。于是我国谓现世各国既已脱离金本位制,金尚不能有安定状态,美金即不能为此后银价之标准,银价应与其他物价比较,方能真确。毕氏对比亦表赞同。

以上均为在华盛顿所谈之事。旋至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按大会组织,计分两大组:(一)金融财政;(二)经济。金融组下复分二组:(甲)治标。凡急谋解决者皆入该组,如资金之流通,债务

之整理,信用之巩固,汇兑之管理,物价之平准等属之;(乙)治本。如确定国际货币本位,各国中央银行合作,限制现金用途,中央银行之准备金,及我人所注意之白银问题等属之。属于经济组者,如通商办法,关税政策,产销合作,航业津贴等,皆分门别类,列入讨论。

初开会数日间,各国政府首席代表宣读论文,均头头是道,深知症结所在。且有人谓如此会再无结果,则今日世界之政治家可称完全破产,斯时一般表示之密切,及希望成功之热忱,概可想见。大会复组织干部,处理全会事务,加入干部者凡十六国,中国亦在内。由英首相麦克唐纳为主席。金融及经济两组主席,各方竞争颇烈。于是决定每组设正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报告员一人。金融组正主席为美代表,意、奥两国代表副之,法代表为报告员。经济组正主席为荷代表,德与阿根廷两国代表副之,英代表为报告员。两组人选安排既定,分组各自开会。第一组,英国主张先谈信用政策与物价平准,各方意见庞杂,一无结果,仅组起草委员会,研究草案。第二组由毕德门提出方案,即作为讨论根据,分二专门委员会研究之,一为白银委员会,一为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用金为本位及减少中央银行准备金为百分之二十五,大体通过。惟对中央银行合作及政策,主张由美联邦准备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另行召集会议商定之。

詎各分组正在开始讨论,即闻有英、美、法三大银行总理在伦敦银行开会,讨论安定汇价之举。有谓此三巨头会议,实控制大会全局。但其结果未蒙美总统罗斯福之采纳。盖美总统正实行其所谓通货膨胀政策,物价步涨。但此种涨价,并非货物真有销路,似我上海市面上所谓“客帮发动”者。时法国代表即表示美汇如此步涨,经济问题,已不能继续再谈,形势紧张,几陷僵局。英国复思挽回,商得各国同意,请美代表电美总统于开会时间,将美汇维持安定,无如仍不为美总统所采纳。于是法国首先表示不满,主张大会

延会,其他用金国家如荷兰、瑞士、意大利、比利时等,皆一致赞成与法国打成一片,五国便成一用金国。主席麦克唐纳只好召集干部会议,开会时,余与颜公使同往出席,各组主席,曾联合要求干部主席宣言:谓小组会议,能继续者继续,不能继续者停止,大会停开,干部与主席暂留。美代表谓干部十六国,不能负此责任,须由大会决定,并力述金融问题外,尚有其他问题,可资讨论。但用金国无论如何,不愿参加。嗣由干部决定,请由各小组会商,将所有有讨论价值问题,送交干部决定,大会因此仍得存在。自经此决定后,各小组纷纷工作,英代表主张在第一组宣称治标各问题,皆有讨论之价值。惟法代表除债务问题外,余均不愿讨论。结果虽以二十五对十五通过英国主张,而第一组会议仍难进行。于此可见当时人心涣散,会务已入停顿状态,殊令人有虎头蛇尾之感。

至于白银问题。毕德门氏颇希望与加拿大、墨西哥、波尔维亚、秘鲁、西班牙及中国等合作,一致对付印度。毕氏之意,现在世界银价不安定之原因,全由于印度存银过多,及其随时出售政策。假定印度不以存银售出,或限制售数,则世界白银必回复自然供求相应的状态,而趋于安定。当时双方争辩甚烈,各国均以银价提高后,究竟于用银国为利为害,征询中国意见,余等仍根据华盛顿预备会议所表示之意见以为答复。嗣在会外商定,印度年售三千五百万盎司,自明年一月起,以四年为期。中国对此计划亦望成功,因与安定银价有益。美国与印度亦希望中国加入,以便中国处于见证地位,可向世界表示此种合作之信实也。至于我国加入银合同后所负之责任,即四年以内政府不将银币之银,售出市面。此则欧美各国恐我国在四年以内,改用金本位之故,实则世界金本位既呈动摇现象,我国于四年内,亦未必有此改革也。

最后,述会场中所见趣事一则,以作结论。

干部会议于大会延期问题不能解决时,美代表拟打电回国请示,须后日可望复电,故请干部延会至后日下午三时再开。法国坚

持至迟延至后日十时,故意为难。对于数小时之差别,一时竟大起争论,主席付表决时,对于两种表决,全场均不举手,主席乃宣布现决定后日三时。因大众既不举手,即可以主席之意决定,盖主席照例多一票。于此可见世界伟人开会,有时亦未尝不带孩儿气也。

(《中行生活》十八期,1933年)

编后絮语

这篇文章实际也是一份重要而珍贵的史料,如实记录了当年中国银行家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经历与见闻。事实上,不仅是贝祖诒本人,包括陈光甫、张嘉璈、宋子文等一批民国银行家,当年曾经代表中国参与了许多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93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开始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元作为流通货币。尽管如此,中国币制仍受到国际银价波动极大的影响。当时主导世界金融秩序的势力主要是美、英、法等国,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这一点,从贝先生的记述中即可明显感觉得到。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改革,废止银本位制,采行纸币制;某种意义上说,与这次会议埋下的伏笔或许不无关系。

陈光甫(1881~1976)

原名辉祖,后改辉德,江苏镇江人,清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六日(1881年12月17日)生。美国圣路易商业学校肄业,1906年后转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商业学校就读,毕业后在美国银行实习。1911年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同年12月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1913年辞职后一度任中国银行顾问。1915年6月与庄得之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1918年任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1920年任银行公会联合会议上海代表。1927年3月任“江苏和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发行“江海关二五赋税库券”。1933年10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另曾任淮海实业银行董事,常州商业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以及交通银行、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通和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中国国货银行常务董事,江苏省农民银行监理委员,徐州国民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等职。1936年3月代表国民政府财政部赴美谈判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抗战爆发后,一度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4月任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10月,以国民政府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呼吁对中国投资。在美国时,与李铭及美国人合资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又设立“上海银行纽约通讯处”。后曾任宝丰保险公司董事等职。1949年3月赴曼谷参加联合国远东经济会议,会后定居香港。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为上海商业银行,不久在台北成立上海银行总管理处,晚年迁居台北。1976年7月1日去世。



这次经济学社年会的论文题目,是“改造中国经济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这个题目,范围广博,学殖荒落如我,实在是无可贡献。最近我在长江流域,以及沿陇海、津浦一带,旅行一次,却得到不少的感想,且把我的感想,随便说说。

(1) 全国经济的不平均发展

我到内地旅行,已不止一次,但总不如此番所得的印象来得深刻。我们平日常见的沿海通商大埠,有银行,有交易所,有大工厂,有大公司,有信用借贷的组织和产销贩卖的机关,但在地广民众的我国,真不过是“太仓一粟”,对于全国经济生活,可谓全无认识。所以不谈我国经济问题则已,谈到经济,第一当注意全国的不平均发展。

不平均的发展,已把我国划成了两个阶段,在经济过程上,相去至少有数百年。然而通商口岸的繁荣,却完全依赖内地的生产力。自从各国实行经济侵略,内地的经济基础逐渐在那里动摇。他们用科学方法生产,我们仍不免受自然的支配,以致衣食住行,无一不仰给于人。直至前年水灾发生,连号称富庶的中部,也暴露了农村破产的真相。这是我所目击而心伤的一件事。

我们目前无须高谈远大的经济问题,如币制、关税、失业等等,简直可以不必讨论。各国早已解决了他们本身问题,对于最近国际间的困难,无非彼此求得妥协条件,以为重整旗鼓之计,而我国则本身问题尚且没有办法,如何谈得到此?内地老百姓所眠思梦想的,乃在有无饭吃,有无衣穿,现在且问他们有吃有穿吗?